



历史研究方法（二）

吴焯 主编

## 目 录

考证的辨析(续) .....	1
如何进行考证工作(续) .....	1
历史考证释疑 .....	10
历史工作者的发展方向 .....	13
历史研究案例 .....	23
老子考辨 .....	23
《竹书纪年》辨伪 .....	26
论齐伐燕事 .....	32
洙泗考信录(节录) .....	34
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	42
《晋书·地理志》考察 .....	61
《元史》中的地理记述 .....	64
论《老子》成书年代 .....	66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节录) .....	69
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 .....	75
《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一节(上略) .....	82
范文澜谈历史研究方法 .....	85
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问题 .....	105
历史研究的方法 .....	118
社会调查和历史学研究 .....	129
历史研究与“体验和想像” .....	137
农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141

## 考证的辨析（续）

### 如何进行考证工作（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错误也不少。如以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为吴王余昧元年，即是一例。余昧兄余祭元年在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即鲁襄公二十六年，在位四年卒。《春秋》襄公二十九年书：“阖弑吴子余祭。”《左传》：“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阖，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阖以刀弑之。”《史记·吴太伯世家》误书为“十七年王余祭卒”《十二诸侯年表》同误。其实，吴王余昧元年应在周景王二年（公元前543年）（《辞海》卷末的“十二诸侯纪年表”依《史记》余祭在位十七年，余昧元年在景王十五年，亦误）。

《史记》两年表的错误很多，不能尽举，今人据《竹书纪年》多所订正。因《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记战国事最真确，这也证明第一手材料在考证上的重要。

颜师古的《汉书》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但是，我们也不能处处盲从。如《汉书·功臣表》：“留侯张良以韩申都下韩。”颜注：“韩申都，即韩王信也。《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音。”连刘知几对颜说也深信不疑。《汉书·张良传》：“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为韩王，以良为韩司徒。”可见，韩司徒是项梁授予张良的官职。《汉书·功臣表》的“韩申都”、《史记·留侯世家》的“韩申徒”都是韩司徒的同

音假借，颜师古以韩司徒张良为韩王信，显然是错误的。

上举史书记载错误，不过是几个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在读古书时，一定要十分细心，不可大意，倘若粗心浮气，不仅不能发现问题，而且会跟着犯错误。

五，不要用很晚出的书里的材料来解释古代的历史和古礼。

过去讲周代历史的人，往往都喜欢用《周礼》做证据，来解释西周的礼制和史事。解放以后，依然如此。客观原因是周代的史料少，在没有办法时，往往乞助于《周礼》。《周礼》成书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时期，假定它编成于战国，距离周初也有六七百年了。先秦古书没有引用《周礼》的，也没有一部书和它的写法一样。显然，《周礼》的作者根据一些先秦的零碎材料，加以系统的整理，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然而这个理想国与先秦古籍和金文往往抵牾。例如，孟子讲西周封国，公百里，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符合周代的情况，因为当时人口不多，占地也很小。到战国时，各国疆域扩大很多了，于是《周礼》根据战国的情况，解说周初的封国：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再如讲九服，《尚书·酒诰》说到内服、外服，内服即王畿，外服即诸侯（据《令彝》与《大盂鼎》殷周只有侯、甸、男三服，无卫服）。《国语》把它变成五服，名字也不一样了；《周礼》又把它变成九服，每服五百里，实则周制决不可能如此整齐，疆土也不可能如此之大。再如讲赋税制度，与其他古书记载全不一样。其他如土地制度、军队制度、乡遂制度、官制，无不如此。春秋以前不用“军”字表示军队的名称，一

般叫“师”，或是叫“旅”；春秋时代才开始有“军”的名称，但仍然是师、军并用，到战国时才一律称“军”。而《周礼》却讲周代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等等，显然是出于想象。再如官制，《周礼》把西周职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冢宰、宗伯、司徒、司马、司寇（冬官缺，当是司空）等官为六官之长，这样整齐的官制不见于《尚书》和金文，故知其全出自理想。再如，金文中常见“善夫”之官，是天子近臣，掌出纳王命之职。到《周礼》，“善夫”变成了“膳夫”，成了厨师。又如“师氏”，原是领兵的官，到《周礼》却成了教书的老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显然，我们不能依据这样一部书来解释周代的制度。

汉人写书好称引古昔，广搜博采，以多为胜。有的书记三代名物、典章制度、帝王世系等，无所不备。如《礼记·明堂位》记述虞、夏、殷、周的礼器，车、马、尊、爵、俎、豆等等，应有尽有，灿然大备。车，有虞氏是鸾车，夏后氏是鸾车，殷人是大路，周人是乘路；尊，有虞氏的叫泰，夏后氏的叫山钩，殷人的叫著，周人的叫牺象。如果三代礼器到汉代还如此详备，为什么春秋时的孔子还要发出“文献不足征”的慨叹呢？这里的奥妙，是不言自明的。

《淮南子》一书，内容也极驳杂，有些简直是无稽之谈。比如，书中记载上古的疆域时说：“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夏桀、殷周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据此，则夏殷之时不仅疆域辽阔，北到今天的长城以外，南到今天的越南北部，西到今天的敦煌，东到大海，而且有了郡县制。可以与这种记载相媲美的还有《大戴礼记》，说颛

项时的疆域就“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四至的地名虽略有变动，版图并未缩小，年代却又大大地推前了。如果据此，中国自远古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我们当然不能上这种书的当。孟子说过：“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荀子也说：“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诗·商颂》炫耀般的武功，也只说“邦畿千里”。大一统的局面直到秦始皇时才出现《琅琊刻石》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明眼人一看便知，《琅琊刻石》正是《淮南子》、《大戴礼记》所说疆域的蓝本。

夏商周三代文字史料少，许多问题一时弄不清楚，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可以付之阙如，留待将来。切切不可妄立新说，再从晚出古书中来寻找“证据”，这种情况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

六，不要牵强附会，曲解材料，特别是不要滥用同音假借的办法。

古代由于字少，字义也不固定，只要音相同，往往可以通用，这就是所谓“同音假借”。这种情况到汉以后就比较少了，先秦时则很多。后代有些人就因此而滥用通假的方法去解释古书，成了一种弊病。举例来说，《诗·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肆。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这里的“汝”，是指河南的汝水，诗的本义可能是写一个妇人去寻找自己的男人，以及他们见面的情况。这本来是很简单明了的，但一位古史家却解释得非常离奇。他引《竹书纪年》宣王三十六年“王伐条戎，

奔戎，王师败绩”的记载，说《汝坟》里的“条枚”就是指条戎；并且引《孟子》、《左传》，证明“条”也就是“分鲁公以殷民六族”里的条氏；另外，秦国有徐氏、修鱼氏，他说徐、修、条都是同音，所以都通用。又说鲁公伯禽伐淮夷，这个“淮”字古音读如“椎”（音堆），椎、条声母同为定钮，所以淮夷与条戎也是一族。又与鸣条之条同音，而鸣条是叟瞞的倒音，即鸣与瞞同音，条与叟同音，所以它们也是一族。叟瞞在春秋时属于长狄。这样一来，西戎、淮夷、北狄、东方殷民六族，全是一族。又说汝坟之坟古音奔，所以就是奔戎；奔与彭同音，所以它和大彭（在河南、湖北之间）也是一族；而条和巢也同音，所以它和安徽一带的巢国也是一族。按照这种解释，周的四围的少数民族都成一族了。诗中有“王室如燬”一语，宣王虽打过败仗，也不至于这样，显然这是东迁以后的诗，作者却说成宣王时，而且把东南西北的各族人都说成一家，这种考证方法实在是牵强附会得近乎游戏。

再举一个例子。殷人习俗用甲、乙、丙、丁等天干字作庙号，所以青铜器铭文中常常见到“父丁”、“祖甲”、“妣丙”之类的称呼。当时十个天干字的写法与现在很不一样，如“丁”写作“𠂔”，“丙”写作“𠂔”，这是稍具古文字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但是，有人在考证古史时却别出心裁地说，“𠂔”不是“丁”字，而是“珠”字，“𠂔”是“鉏”字。又说珠与鉏、铸、聊、祝、楚等同音，因此可以通用。由于古书上有“帝尝封于鉏”的记载，所以凡有这类铭文的青铜器都属于五帝时期的制作物。他还据此进一步“考证”出了七种“五帝时期的货币”，从唐尧、帝尝到轩辕、颛顼、神农时

的货币色色俱全。他还断言，“商三句兵”中的第一个“大父日癸”就是帝颛顼祖珠的元子、帝颛顼柱氏的首目。第二个“大父日癸”多是前者的继承人，是掌握祭祀大典的礼官。他还声称，根据金文族称的音标规律，可以整理出一部“有系统的五帝简史”，云云。象他这样判定铜器的时代，真比变戏法还容易，既不需要考古地层学和器形学的科学证明，也不需要古文献的确切根据，只要靠一两个字的“通转”，就把大批商周青铜器划入五帝时代。虽然结论耸人听闻，但终究是纸糊的房子，经不起一戳。

在古汉语中，语音与语义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不能认为某音必然要表达某义。我们应当吸取汉人滥用声训的教训，使用声训方法时，一定要十分慎重，要有足够的证据。如果把通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双声叠韵，牵强附会，强作新解，就会笑话百出，使考证庸俗化。因为按照那种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说刘备就是吕布，刘、吕是双声，备、布也是双声。也可以说庄周就是杨朱，庄、杨迭韵，周、朱双声。还可以说兔就是虎、鸽就是鹤，因为它们都是同韵字。甚至可以说鱼就是象，鱼是鱼部字，象是阳部字，鱼阳可以对转。这种例子简直举不胜举。可见，在考释字义时乞助于通假、通转，虽然能左右逢源、随心所欲，却是十分危险的。总之，用通假办法去解古书，必须有证据，没有证据就是主观臆断。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二千多年前的孔子都懂得证据的重要性，今天的学者反而不懂，就很不应该了。

七，有人为了政治上的斗争，假借学术上的考证之

名，只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提出新的解释，而不要坚实可靠的证据，虽可蒙骗于一时，假象终会被拆穿。这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派今文学家所做的考证，作为只凭想象，不要证据的典型。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依照他的观点，凡古文经都是出于刘歆伪造，象《左传》、《古文尚书》、《周礼》、《逸礼》等等，全是刘歆一手伪造出来的。这种看法是否有什么根据呢？没有，完全是出于主观想象。现在相信他的说法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他的论点实在站不住脚。但也有少数人例外，不久前还有人写文章、写书，替康有为辩护，但他的一些所谓“证据”却十分可笑。例如他根据司马迁说过左丘明作“春秋国语”，没有说作《左传》，所以《左传》肯定是刘歆伪造的。他不知汉代今文学称《公羊传》为《春秋》，古文家则称《左传》为《春秋》，这是有明证的。而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明明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可能是《左传》的旧称，怎么能说司马迁未说《左传》是左丘明作的呢？他还说《左传》是抄袭《史记》而成。我们知道，《左传》最晚成书于战国，怎么可能抄《史记》呢？果真如此，《左传》就应当与《史记》记事一样，但实际上《左传》和《史记》说的往往不一样。例如《左传》说共伯和干王位，而《史记》则说是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史记·晋世家》讲赵盾全家被屠岸贾所杀，只剩下一个孤儿，并且还有程婴、公孙杵臼等救孤儿，为赵家报仇的故事，《左传》里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怎么能够说《左传》是抄袭《史记》的呢？象这一类的所谓考证，就是不要客观证据，全凭主观想象。

搞考证不要证据，只凭驰骋主观想象，哗众取宠，这类例子太多了，可以不谈。不过近来在某些研究专史的同志中，又出现这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把许多事物都要追溯到殷商，似乎殷商是一切文明的渊源，什么东西都是殷代已有之。为了证成其说，他们任意曲解甲骨文字。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六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庚午卜贞，乎 舞，从雨。”意思是说，庚午这一天卜问，用 祭和舞蹈来祈求纵雨是吉还是不吉。 字在这里当祭名用，在甲骨卜辞中一般与战事有关。有人在撰写体育史时，对这条卜辞作了别出心裁的解释。他说“ ”是踢足球的象形字， 象足球， 是踢球的双脚，这条卜辞是说用踢足球和跳舞的形式来求雨。他据此断言，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就有了足球这种体育运动。由于说法新奇，吸引了一些不懂古文字学的读者。我们要问，用踢足球的方式求雨，这在古代文献上有根据吗？殷代已有足球运动，那么周秦两汉有没有相应的记载？ 是踢足球的象形字，那么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围）字，能不能说就是足球比赛的象形字呢？

还有人根据卜辞中“甲戌卜，殷贞，我马及”一条，断定“我马”就是“我的骑兵”，进而推定殷人已“在战争中使用骑兵了”。何以见得“我马”就是“我的骑兵”？难道二者是同一物？我国直到春秋时都还没有骑兵，怎么殷代反倒有了？这种态度不免太草率。

有的搞农业史的同志，把甲骨文中的 字说成是蜜蜂，并推定我国益虫利用的技术始于殷代。象这一类的“祖国之最”，这几年见得很多，纯粹是猜谜射覆，如同儿戏，毫无科学性可言。

古文字考证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是很不容

易做好的，前辈学者曾有“一字十年得”之慨叹。考证文字需要有丰富的知识、严肃的态度和周密的分析，不能单单从字形上猜测，必须要有文献和考古材料的证据，才能下结论。有些人害怕下功夫，总是用想象代替科学研究，这是十分有害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八，做考证要十分小心谨慎，不要轻易下结论。应如朱熹所说，象“老吏断狱”一样，决不能草率从事。

这一点正是今天许多人最不注意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胭脂》，讲施润章（愚山）断案的故事。被告人蒙冤被判了死刑，不服，上告到道台那里，道台维持原判。最后告到施润章那里，他感到案情有可疑之处，于是细心调查，终于使冤情大白。我们做考证时，也要有这种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

古人往往也很粗心，因此古书中张冠李戴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春秋时鲁国人南宫适字子容，一称南容，孔子在《论语》中曾三次提到他，称赞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且“以其兄之子妻之”，说他是一位“尚德”之人。而《左传》上有一个叫南宫说（又名縉）的人，又叫南宫敬叔，是鲁国的大夫。郑玄于《礼记·檀弓》“南宫縉之妻之姑之表”下注云：“南宫縉，孟僖子之子南宫阅也，字子容，其妻孔子之兄女。”于是将南宫适与南宫縉二人误认为一，一个“尚德”的君子变为“载宝而朝”的官僚。后来杜预注《左传》，司马贞注《史记》，朱熹注《论语》都沿袭了这个错误，于是使南容受诬千古，直到崔述作《洙泗考信余录》才弄清了这个错误。

再如，《韩诗外传》有这样一段话：“颜渊侍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

御也！’颜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将逸。’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逸闻。”这段话是从《吕氏春秋》中抄来的，但又抄错了。原文是记颜阖与庄公的对话，《韩诗外传》讹为颜渊与定公的对话。定公时，颜渊年岁尚少，不可能“侍鲁定公于台”。刘向作《新序》也采《韩诗外传》之说，以为史实。其实《吕氏春秋》所记颜阖与庄公的对话，也是虚构的，不过是主张黄老之学的人，假托此事打个比喻，希望执政者虚静无为。《韩诗外传》将颜阖误成颜渊，又将虚事当史实，实在是太粗心。

总之，读书时，稍一疏忽就会出差错。不求甚解，用想当然来代替研究，就会指张三为李四，在此基础上再加推论，就会导出违背事实的结论，说得越多，则错得越多。这类教训是值得我们很好吸取的。

## 历史考证释疑

通过上面的分析，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建国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优良的史学遗产，包括考证方法在内，弃置不顾，这样就无法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的真实相结合，因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现在这个倾向更加厉害，强调新理论，反对考证，尤其是否定乾嘉学派之风又刮起来了，对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看呢？下面谈谈我们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所谓理论，据说就是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说它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所产生的新理论，它将对历史研究发生巨大影响。就是说，用这种理论研究历史将使历史科学产生巨大的飞跃。如果真能这样，

当然会受到广大历史工作者的欢迎。不过截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方面的文章还不多，至于如何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历史工作上，文章更少。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空谈理论不能解决问题，希望有人为大家作些示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有的文章说“旧有体系”已经产生“危机”，就是说，它的理论往往与事实相反，产生所谓“反常”现象，“反常”现象越来越多，就会形成“危机”，因此必然要有新的理论排除这种“反常”现象，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创造。那么这新理论是不是要取“旧体系”而代之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上文已经谈过，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的。它的基本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因为个别论点的不适应而动摇或过时，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

三，是不是讲理论就必须反对考证呢？是一般地反对考证，还是只反对乾嘉学派？我们以为研究历史必须结合实际，而历史实际必须是真实的，因此任何理论都不能排除历史考证。乾嘉学派固然讲考证，但考证不等于乾嘉学派，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说一般地反对考证，那我们必将倒退到建国以来走过的老路上去，肯定不会有出路。如果说只反乾嘉学派，那等于无的放矢。因为今天恐怕不会有历史工作者重走乾嘉学派的老路，那也是倒退。因为乾嘉学派有一个特点，就是迷信汉儒，对宋儒则一概排斥，所以又称为汉学。但是搞考证并不一定要搞汉学，例如乾嘉时期考证古史最有成绩的学者崔述，就是推崇朱熹的，他在《洪范补说》中说：

“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三）他的名著《考信录》的确做到不存汉宋之见，凡是错的，一概否认，丝毫没有佞汉的气味。

四，有人反对烦琐考证，这是对的，但是考证不一定就烦琐。陈垣先生以考证闻名，他就反对搞烦琐考证。而且，烦琐不烦琐因时而异、因人而异。陈先生的著作中有不少考证文章，在外行人看来象是烦琐，在内行人看来就不是烦琐。因为有些史事不弄清楚，就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不能看到考证多一些就是烦琐考证。乾嘉诸大家的考证文章，也不都是烦琐考证，要作具体分析。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在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尊重和吸收他们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

应当指出，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只有前进，不能后退。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和教师多少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不可能再走乾嘉学派的老路。过去我们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许多优秀的遗产都丢掉了，因而不愿意或不屑于去做艰苦的考证工作，只凭一些理论教条，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搞以论代史。结果如何呢？养成了束书不观，专搞假、大、空的坏风气，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一定要详细占有材料，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不搞考证，连所用史料的真伪都不如道，怎么能去伪存真呢？“文革”中，“四人帮”伪造儒法斗争史，风靡全国，回顾这段历史，真令人痛心。今天有人又来提倡专搞所

谓的理论，我很担心会重蹈覆辙。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三复斯言。

## 历史工作者的发展方向

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历史工作的成绩和今天所肩负的任务是很有意义的。很清楚，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存在不少的缺点。成绩是巨大的，主要是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释历史上的非常复杂的现象和事件，打破了一切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史学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因而开辟了史学的新天地。可是同时，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的基本原理还吃得不够深透，不善于把马克思的原理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又背起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这样就阻碍了历史研究的大踏步前进。今天历史工作者的最主要的任务，我以为就是从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下解放出来。怎样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呢？我想提出下面几点意见：

一，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前进、局势的变化、科学的进步而向前迈进。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 19 世纪，列宁逝世于 20 世纪初，他们都不能预见到 20 世纪社会的变化，因而他们也不可能为他们所未见到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答案。因此如果我们碰到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的答案，那就是十足的教条主义。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但是应用到实际上，就必须根据每

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确定他们应当走的道路，不能把某一国家当作自己必须仿效的模式。如果那样做了，就是教条主义，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不要把“两个凡是”也用到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身上，这样我们的精神枷锁就可除掉了。

二，同样，对于各国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也不应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去找现成的答案，因为他们所讲历史发展规律主要是根据欧洲的历史。他们对于亚洲的历史，除对印度等少数国家外，所知甚少，对于中国的古代史，他们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有时好象也谈到，比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接触到中国历史的实际。因之不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讲历史规律看成全世界都适用的，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以欧洲为标本而提出的历史规律照搬到中国历史来套用。如果这样就会在有意无意中，用欧洲历史发展规律来代替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这样就在历史研究上犯了绝大错误。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有史以来就和欧洲不同，到了近代现代就更加不同，这是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说欧洲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会相同或相似呢？因此，我以为我国的历史工作者今后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事实寻找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我们才能从欧洲历史发展规律或欧洲中心论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三，另一方面，有的历史工作者，特别是年青的同志，看到马克思主义对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解释与现今的历史实际不太符合，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反常，甚至想用现今自然科学的方法取而代之。我们认为这未免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对历

史问题的某些论点不符合今天的实际并不奇怪。因为如上面所说，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不可能预见到今天世界历史的发展，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可以抛弃。如果那样认识的话，今后我们的历史研究很可能走回头路，那是很危险的。前面我们谈到，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于历史问题的观点有它的局限性，不是不论古今中外一律适用，因此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过去一些过“左”的搞法。但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问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出了毛病，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这是错误的。

四，有些同志们一方面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想否定一切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认为什么乾嘉学派那一套繁琐考证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在第四章里已讲过，不必细说。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没有人完全照搬乾嘉学派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其中的考证方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却不能一概否定。否定一切正是一种极“左”的口号，不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任何好处。否定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恶果是有目共睹的。1958年的“教育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否定传统，否定文化，也否定了历史。今天的年青同志们没有看到当时的极“左”的危害，又唱出类似的高调，我们觉得应当慎重而又慎重，以免重蹈覆辙。

五，历史研究方法应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旧法，泥古不化，因此我们欢迎新的研究方法，对基于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而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当然不会加以排斥。问题是新的研究方法不应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